

梁宗岱诗歌翻译与译者主体性研究

方圆平¹ 全继刚²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 不同于传统翻译观对译者“隐身”或是“仆从”的定位,现代阐释学以来,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结合对译者与作品的考察,在对翻译本质与过程的了解中,我们能够进一步意识到译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重要作用。梁宗岱是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的诗人与文学翻译家,其出于批判性的文学眼光对翻译文本进行挑选,亦推崇“作品必须在译者心理唤起感应”的翻译思想,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本文以梁宗岱的翻译活动为例,从译者对原语文本的选择、译者的翻译动机、译者的翻译原则以及译者与原作者的交往等方面,讨论译者主体性于翻译活动中的体现。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梁宗岱; 诗歌翻译; 现代阐释学

Research on Liang Zongdai's Poet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Yuanping Fang¹, Jigang Quan²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 As a famous poet and literary translato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China, Liang Zongdai, both his choice of translated texts due to his literary vision or his translation thoughts, reflect that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give full pla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is article will take Liang Zongdai's translation work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cluding the translator's motivation,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translation principal,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original author.

Keyword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Liang Zongdai; Poetry translation; Modern hermeneutic theories

一、译者主体性的确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翻译作品的研究中,学界主要关注的是翻译的结果——在译文与原文的关系中,译文是否能够忠实而客观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风格是评价翻译好坏的重要标准,翻译研究者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语言的层面上。但是随着现代翻译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以及文字意义

的不确定性使得译者从客观上无法亦步亦趋地紧随原作。现代阐释学从理论上确立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而在对翻译本质与过程的深入了解中,我们能够进一步意识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如何发挥的。

1. 传统译论中译者的定位

在传统译论中,人们关注的主要是翻译中文本的转换结果,较少考虑翻译的复杂过程,因此译者被视作两种文字之间的“传声筒”,一直以来都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译者会被读者视作一个从属的“仆人”角色,因为译者在读者眼中仅仅是在“传达”作者所写的话语的意思,译文中并不存在个人的创造;另一方面,译者自身也会被传统的译论观点所束缚,会不自觉地在翻译过程中将自己定位为“仆人”的角色,忠诚地服务于原著与读者这两个主人。

另一个传统翻译观念就是译者的“隐身论”。如钱

作者简介:

方圆平,女(1995.8-),浙江淳安人,法语笔译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法语教学与翻译研究。

全继刚,男,(1977.6-),湖南沅陵人,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翻译研究。

钟书提出的“化境说”——钱钟书主张，在对两个国家语言文字进行转化时，要做到既不因语言习惯差异而显得牵强生硬，又能完全保留原文的意趣风味。如此一来，译本既对原著忠诚，又不会给读者以读译文的感觉，译作臻于化境。

2. 翻译的过程与意义的可理解性

然而，这两种传统译论均将目光停留在语言层面，认为文本意义是确定的，是客观的，因此是可以被理解的，那么翻译的任务无非就是再现译文中的意义。但实际上，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以及文字意义的不确定性使得译者从客观上无法亦步亦趋地紧随原作。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就是对这样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2007：101），并且，索绪尔用“所指”和“能指”代替概念与音响形象。他认为，意义由语言符号间的差异所决定，意义不再稳定，而成了一种不稳定的，能指符号滑动的结果。意义的客观性受到质疑，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够用“忠实”与“等值”去评价翻译呢？

3. 现代阐释学对译者主体性的确立

阐释学是研究文本之意义的理论，它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哲学思潮。现代阐释学的理论研究为审视译者主体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阐释，即借用媒介进行解释。从这一层面来看，语言是理解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而翻译以其特性周旋与两种语言之间。因此，翻译与阐释学天然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是阐释学最有代表性的例证。海德格尔、伽达摩尔和乔治·斯坦纳所代表的现代阐释学从文本的理解讨论译者主体性，为我们理解翻译指出了新的方向。

在伽达摩尔看来，“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关联相脱离，并向新的关系积极地开放”（1999：505），也就是说文字从被原作者写出来以后就与原作者脱离，它的意义是开放的，不是封闭而固定不变的。对于翻译来说，每一代人、每一位译者都必须以新的方式去理解文本，因此理解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这种理解过程就是阅读。理解的主体性、历史性与创造性让我们从原作者走向译者，关注译者的主体性。

在斯坦纳德看来，译者主体性的意义也不言而喻。他提出，译者通过判断选择文本。首先要“信赖”文本。其次，在表达原文意义的时候，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则会“侵入”原文。之后，译者充分发挥其主观因素，消化“吸收”、接纳原文，传达原文意义，最后进行“补偿”，如此一来，译文得以达到理想的平衡。

二、从梁宗岱的诗歌翻译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梁宗岱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与文学翻译家，尽管他翻译的篇章在数量上远不及其他译家，但是他的译作不因时间而褪色，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他于1929年在

《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水仙辞》译作被认为是法国现代诗歌引进中国的开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绝不仅仅是语言的“传声筒”，文字的“摆渡人”。梁宗岱对诗歌作品的选择、他走上翻译道路的原因、所选择的翻译方法以及与欧洲作家的交往无不体现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

1. 诗歌作品选取

梁宗岱原籍广东新会，中学曾就读于远近闻名的培正中学，在中学时期便显露出高超的文学才情，出版译作，小有名气。后来梁宗岱被保送进岭南大学英语系学习，因而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梁宗岱的翻译生涯最早能追溯到他游学欧洲的时代，他在旅居欧洲期间学习并精通了多门外语，因此，其翻译对法、德、意大利等国作品均有涉猎。

梁宗岱的翻译事业基于其自身的文学品味与追求。在其翻译生涯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文学偏好。梁宗岱对欧洲诗歌具有极大热诚，留下了多首诗歌翻译名篇，无论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还是辑录他所译欧洲诗作的合集《一切的峰顶》，只有作品打动他，他才会提笔翻译。正如他本人在《一切的峰顶》序言中所说，自己所译的只不过是“觉得比较可译或偶然兴到试译的罢了”（2003：50）。他翻译的目的纯粹，兴到择作品而译，对作品的选择具有极大自主性。

2. 翻译动机

作为民国时期的文人，梁宗岱亦抱有当时文人之风骨，怀有对家国的责任与担当。因此在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时，他便抱有“故处今日而欲补救此弊，必于古今中外之道德，参详之，溶化之，用其长以补吾短，以成一种真正适合之道德，而陶铸吾国民臻于纯美之域”（2003：49）的目的，远赴欧洲求学。他总是期望以文学与翻译促进当时中国的文化建设。谓之“去到了光鲜明媚的新大陆，繁华热闹的新世界；吸收那清爽活泼的新空气，澎湃汹涌的新潮流，灌输到沉寂寞的祖国去。”（2003：49）梁宗岱向国内介绍法国的象征派诗歌，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三百余行的长诗翻译《水仙辞》，被文学史家视作法国现代派诗歌真正被引进中国的开始，推进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

除了介绍外国诗歌进入中国，梁宗岱从事翻译亦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之所以译介瓦雷里，是因为他觉得“在《水仙辞》中感受到的这种恬静，这种纯粹，令瓦雷里更接近某些中国诗人，因为里面包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虚无主义。比如王维，他的诗如此理性，又如此感性……”（2012：58）他在法兰西的国土上也不忘向法国读者介绍古典诗歌，他爱“吾国之陶潜、王维”，在巴黎出版《法译陶潜诗选》（Les Poèmes de T'ao Ts'ien），瓦雷里为其作序，评价极高。正如从事现代诗

学研究的陈太胜教授所言，“对梁宗岱这样兼有学者、诗人和翻译家多重身份的人来说，译笔生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外国文学和文论的介绍，而是通过翻译所达成的文化借鉴。”（2016：8）

3. 翻译原则

在所有的文学翻译中，由于诗歌在极少的文字中凝结着丰富的意蕴，使得诗歌的翻译几近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正如梁宗岱所说，“作者与译者感受程度的深浅，艺术手腕的强弱，和两国文字根深蒂固的基本差别……这些都是明显的，也许不可越的困难。”（2003：49）译者既要忠实客观传达诗人本意、思想、感情与意境，还要最大程度还原诗歌的形式与音韵，这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就显得尤为困难。一些近乎盲目地忠实于原诗歌而产生的翻译作品难以真正传达原文的神韵，这种机械的翻译也难以在审美上符合读者的期待。因此，译者需要发挥主动性，积极对原诗进行“再创造”，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使原作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到新生。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尤为突出。尤其从文学翻译层面来说，梁宗岱的翻译活动是译者本身文学素养与对诗歌的理解的体现。他的诗论与诗歌翻译是相互影响的。梁宗岱曾在《谈诗》中谈到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他认为诗歌是诗人“内”与“外”的统一，既是内倾的心灵体验，也是外倾的意向呈现。他重视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不仅如此，他认为诗歌的每一个字都是慎重而恰当的选择，“我说‘连他们癖爱的字眼……’其实有些字是诗人们最隐秘最深沉的心声，代表他们精神的本质或灵魂的怅望的，往往在他们凝神握管的刹那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2003：157）对梁宗岱来说，无论是诗歌的字句还是次序都是至善至美的，因此，即使在两国文字的转换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他仍坚持译者要解决外文的构造，传达原作的气韵。

4. 译者与原文作者的交往

翻译并不是一项闭门造车的活动，翻译本身便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字的意义是不固定的，译者在理解原本时，纵使译者的语言水平再高，对原作的研究再深入，也可能遇到意义模棱两可的字句与段落，因为时代或距离的原因，译者不一定能够面对面与原作者进行对话，翻译的结果自然也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梁宗岱在旅欧期间广泛结交欧洲文人，与同时代的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不乏瓦莱里、罗曼·罗兰等法国文学大师，这不仅造就了他扎实的语言功底，还使得他对欧洲文学与诗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梁宗岱《法译陶潜诗选》及其翻译瓦莱里作品《水仙辞》的出版，都离不开其与作家积极密切交往的推动。近年出版的《梁宗岱早期注著译》中收集了梁宗岱与海外各个作家的往来书信。瓦莱里在《法译陶潜诗选》信

束序言中如此评价梁宗岱对诗歌的热情：“他跟我谈诗带着一种热情，一进入这个崇高的话题，就收敛笑容，甚至露出几分狂热，这种罕见的火焰令我喜欢”（2016：205），瓦莱里亦高度评价了梁宗岱的翻译水平，认为他所翻译的陶渊明诗歌“给人一种重量和力量的感觉……形式的连贯、文章单位的调配及构成它的遣词造句有一股气味”、重视诗歌的“音乐”性。《水仙辞》的翻译更可以说是在梁宗岱与原文作者的解读下完成的。梁宗岱与瓦莱里交往密切，甚至在其回到中国以后两人仍然保持书信往来。在翻译《水仙辞》期间，译者由于得到了原文作者的解说，因此敢于脱离原文，在很多地方使用了增添或者意译的手法，其译作得传递出原文作者的意趣风味，影响深远。

三、结语

在对翻译家梁宗岱诗歌翻译的审视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译者的主体性渗透于在翻译过程的各个方面。不管是其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动机，还是翻译原则的确立，亦或是译者与原文作者的交往，梁宗岱作为译者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主观能动性。而对梁宗岱的翻译作品的审视亦能使我们意识到译者角色的演变：从传统的译者“仆人”论、译者“隐身”论，再到译者主体性地位的探索与确立，以及本文以梁宗岱为例，充分认可与探寻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我们的焦点从译者手中之笔挪换到译者本身、文化交流本身，这能够让我们从更为宽广的角度来理解翻译的本质及翻译的复杂过程。

参考文献：

- [1]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3]梁宗岱.梁宗岱文集(III)[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4]刘志侠,卢岚.梁宗岱巴黎文踪(之三)梁宗岱在索尔邦大学[J].书城,2012(09):52-59.
- [5]陈太胜.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N].人民日报,2016-11-15(024).
- [6]梁宗岱.宗岱的世界·诗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 [7]梁宗岱.梁宗岱早期著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8]徐剑.神形兼备格自高——梁宗岱文学翻译述评[J].中国翻译,1998(11):32-35.
- [9]刘志侠.梁宗岱欧游时期的译作[J].新文学史料,2009(2):93-102.
- [10]许钧.翻译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